

王志芳
著



《诗经》

中生活习俗的考古学观察



齊魯書社

王志芳
著

《诗经》

中生活习俗的考古学观察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中生活习俗的考古学观察 / 王志芳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5. 9

ISBN 978 - 7 - 5333 - 3394 - 2

I. ①诗… II. ①王…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2213 号

《诗经》中生活习俗的考古学观察

王志芳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 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125

插 页 2

字 数 261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3394 - 2

定 价 46.00 元

序

两次学位论文的写作使我经历了一次对《诗经》由文学欣赏到史学考证的转变。从文学角度观《诗经》，见其美；从史学角度观《诗经》，见其真。感谢魏耕原先生带我进入《诗经》的文学研读！感谢刘凤君先生指导我运用考古发现进入《诗经》的史学研读！

《诗经》以其记载历史的真实性和记叙内容的丰富性，加之诗歌特有的简洁、凝练、含蓄的艺术性，激励着历代学者的研读热情。许多学者从民俗学角度关注其中的生活习俗，挖掘和探究这些习俗所蕴含的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随着上古考古成果日渐丰富，考古资料逐渐被引进《诗经》研究领域，考古发现的介入推动了《诗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尝试着在借助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侧重于从民俗学和考古学角度，选取《诗经》中记载的农耕、采集、渔猎、畜牧等物质生产习俗和衣、食、住、行、婚姻等社会生活习俗，运用翔实的文献资料和丰富的考古发现，通过文字记载和考古实物的有机结合，对《诗经》表现的诸多生活习俗予以综合考察分析，并通过探求交融了宗教信

仰、生态条件、经济方式、社会制度、民族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生活习俗,探究历史的细节和生活的真实,去接近《诗经》时代人们的世界,从而了解先民的伦理观念、道德信仰、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情感意志,进一步强化人们对《诗经》史料价值的认同和肯定。

《诗经》中以诗歌这种艺术语言表现出来的诸多生活习俗,基本上能找得到与之相应的考古实物,并有《诗经》之外大量古典文献予以资料的支持。《诗经》记载和考古实物相互印证,说明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一致性,从而充分证实了《诗经》对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诗经》是诗,也是史,它以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保存了翔实的历史、文化资料,承担了记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重任。

目 录

序 / 1

绪 言 / 1

一 《诗经》民俗学和考古学研究现状 / 1

二 做一点进一步的研读 / 16

第一章 农耕习俗 / 21

第一节 农耕生产习俗 / 23

一 时序节令 / 23

二 耕种方式 / 25

三 生产工具 / 27

四 耕种过程 / 33

五 作物种类 / 48

六 作物用途 / 58

第二节 农耕信仰习俗 / 62

一 藉田劝农 / 63

二 祈报求丰 / 67

三 预卜祈雨 / 73

第二章 采集习俗 / 78

第一节 采集对象 / 79

第二节 采集品用途 / 83

第三章 渔猎习俗 / 103

第一节 渔业习俗 / 103

一 捕鱼工具 / 104

二 鱼类用途 / 112

第二节 狩猎习俗 / 116

一 狩猎形式 / 119

二 工具方法 / 122

三 猎物用途 / 136

第四章 畜牧习俗 / 143

第一节 饲养方式 / 144

第二节 蓄养种类 / 145

第三节 禽畜利用 / 150

第五章 服饰习俗 / 163

第一节 服装形制 / 164

第二节 服装原料 / 179

第三节 佩饰种类 / 192

一 发饰 / 193

二 颈饰 / 197

三 腰饰 / 198

第四节 佩玉习俗 / 201

第六章 饮食习俗 / 220

第一节 主食种类 / 221

第二节 菜肴类型 / 225

第三节 调料配用 / 230

第四节 饪食器具 / 235

第五节 饮酒习俗 / 244

第六节 饮食惯制 / 262

第七章 居住习俗 / 267

第一节 居住方式 / 268

第二节 营室习俗 / 279

第八章 交通习俗 / 284

第一节 交通设施 / 284

一 陆路 / 284

二 水路 / 293

第二节 交通方式和交通工具 / 295

一 乘车 / 295

二 乘舟 / 309

第九章 婚姻习俗 / 313

第一节 成婚之礼 / 314

第二节 婚姻形态 / 328

结 语 / 357

参考文献 / 365

绪言

一 《诗经》民俗学和考古学研究现状

《诗经》是一部包容多种学科知识的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诗歌集,通过历代学者不同角度和多种方法的解读,其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得以不断丰富和强化,从而使《诗经》学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门显学。对于这门显学,许多学者从考古学角度予以关注,借助于民俗学方法,取证于文献资料,使《诗经》学的深度和广度都得以拓展。

《诗经》凝练、简洁、含蓄的诗句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其中所展示的最贴近民生的一面——生活习俗,蕴含着人生伦理、道德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意志等,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生活细节的历史真实性,其中部分生活习俗可以说居于古代习俗文化的源头位置,为习俗的溯源提供了可靠方向。从《诗经》作为研读对象之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诗经》中记载的诸多生活习俗,从民俗学角度就部分诗篇或某一生活习俗予以研究,《诗经》与民俗的关系也就成为《诗经》综合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诗经》本身习俗内容蕴含的丰富性,决定了历代学者在给予它孜孜不倦的传、笺、注、疏和研读解析中,都会涉及其中的习俗,只是多少有异,详略有别。

孔子针对《诗经》提出的“兴、观、群、怨”中的“观”,即认识到《诗经》记载生活习俗的丰富性这一特点,他认为读《诗经》可以了解风俗盛衰,考见为政得失,因而把它作为撷取习俗民情的来源之一,督促弟子习学。

《诗经》的非经学研究在两汉时已见萌芽,郑玄《诗谱》、焦延寿《易林》^①、传习今文《诗经》的齐鲁韩三家、班固《汉书·地理志》^②等都涉及一些习俗事项,对部分诗篇做了较偏重于民俗学的解释。如《韩诗》以三月上巳节用桃花水祓除不祥的习俗解析《郑风·溱洧》。又如,班固淡化了《诗经》的经学色彩,将《诗经》的风诗纳入其风俗史的考察范畴,显示出独特的观《诗》视角。班固通过对风土习俗中那些明显的地域差异的客观分析,总结出秦人尚武和陈人尚巫、齐风多舒缓之体和郑风多聚会之诗

① (汉)焦延寿著,尚秉和注,常秉义点校《焦氏易林注》,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

②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等结论。班固依各国地理位置言及风俗习惯,引《诗经》证俗,重视发掘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因素,从风俗视角去追溯诗源,审视风诗,揭示被经学政治说教重重覆掩着的《诗经》风诗的真实面貌,在方法上与今天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有相通之处。

清郝懿行与王照圆夫妇的《诗问》对《诗经》从民俗和原始巫术角度做了贴近历史真实的解读,给人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清方玉润足迹几遍天下,对大地山海融结形势非常熟悉,他在这种丰富的生活经历基础上读《诗经》,尤其是读《国风》,自然会感受到各国风尚攸殊,随地变迁,迥不相同,由此而想见当时的歌咏情形。方玉润在一定的民俗背景下,将《诗经》予以情景还原,借助民俗解读《诗经》,以民俗生活激活对诗意的感受和理解。由此而观,在他的《诗经》研究中体现出了一一种明显的民俗学倾向。

民俗学作为一门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承性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最早于20世纪初传入我国。1913年12月,周作人先生在他的《儿歌之研究》一文中,从日本引进并首先使用了“民俗学”这一概念。1920年底,北京大学成立了由周作人先生主持的“歌谣研究会”,把民俗学的研究看作很重要的事业之一,有意识地密切了民俗学与文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诗经》学史上,最早把民俗学知识用于阐释《诗经》中民俗事象,是从闻一多先生开始的,他研究《诗经》的方法和成果,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传统的局囿,真正开辟了《诗经》研究的新时代。他在《风诗类钞》序例提纲中曾明确提出,缩短时间距离,用语体文将《诗经》移至读者的时代,用民俗学、考古学、

语言学等方法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主张把《诗经》当作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来读。^① 这种视角的变化,大大拓宽了《诗经》的研究范围和读者的眼界,开创了《诗经》研究的新局面。他在《风诗类钞》《诗经新义》《诗经通义》《说鱼》《匡斋尺牍》等作品中,联系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民俗学,展示了《诗经》时代的社会风俗、人们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情趣。

作为闻一多先生的弟子,孙作云先生继承和发展了闻一多先生研究《诗经》的方法,收入《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②中的《诗经恋歌发微》《关于上巳节(三月三日)二三事》等文章就是运用民俗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方法来研究彼时社会礼俗的典型。他认为研究古代礼俗和古代文学,应该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观察,如此才能了解许多事物的起源。

胡适先生在《谈谈诗经》^③中倡导用精密的科学方法对《诗经》予以重新训诂,用文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和民俗学的眼光大胆地推翻二千年来附会的曲解,他的新解在当时很受注意,并引起广泛争议。胡适先生的倡导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他运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与社会学的、文学的分析结合起来的《诗经》研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傅斯年先生曾经接受胡适先生的治学思想和研究《诗经》的指导理想,他更加重视历史文献、考古、语言学 and 民俗学资料的综合运用,以之与传统学说比较印证。在《诗经》研究领域,他一

①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四),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7页。

②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③ 《晨报·学林旬刊》20期,1925年。

方面以资料为基础考释《诗经》学的基本问题,一方面以《诗经》为史料论证古史和周代思想,给后代学人以有益的借鉴。

郑振铎先生也是运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诗经》的代表,他认为这种研究较之单以直觉的理智或以古书考证更近于真理,更易于使今人明了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况。俞平伯先生《读〈诗〉札记》^①、刘大白先生《白屋说诗》^②等,也较多地运用民俗学材料解读《诗经》。

高亨先生之《诗经今注》^③解《诗》,比较注意说明有关的习俗和礼制,他认为“三百篇”与我们时代距离遥远,那时,前代甚至原始社会某些习俗的残余盛行,给诗歌以深刻影响,正确认识这些习俗和礼制,是理解诗歌本义的前提之一。

此外,侧重从民俗学角度研究《诗经》的著作,尚有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④、鲍昌《风诗名篇新解》^⑤、周蒙《诗经民俗文化论》^⑥、王巍《诗经民俗文化阐释》^⑦、徐华龙《国风与民俗研究》^⑧、冯作民《诗经》^⑨、李湘《诗经特定名物应用系列新编》^⑩

① 俞平伯《读〈诗〉札记》,北平:人文书店,1936年。

② 刘大白《白屋说诗》,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

③ 高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④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⑤ 鲍昌《风诗名篇新解》,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

⑥ 周蒙《诗经民俗文化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⑦ 王巍《诗经民俗文化阐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⑧ 徐华龙《国风与民俗研究》,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

⑨ 冯作民《诗经》,台北:台湾星光出版社,1980年。

⑩ 李湘《诗经特定名物应用系列新编》,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

等。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在研究方法上打通西方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古典文献的学科壁垒,在以《诗经》为基础文本来探讨中国上古诗歌的发生与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鲍昌《风诗名篇新解》利用民俗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古音韵学、考古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等方法,选取了《国风》中二十四篇有争议的诗进行了考证,并表述了自己的认识。周蒙《诗经民俗文化论》是一部以民俗学研究《诗经》的专题性著作,所论及《诗经》中的民俗文化范围涉及了宗教观念、原始巫术、远古神话、祭祀礼仪、图腾信仰、生殖崇拜、灵物崇拜、生活禁忌、先兆迷信、天文星象、人生礼俗以及中国传统的龙凤文化、龟卜文化、酒文化和药文化等。王巍从民俗学角度,运用历史文献资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诗经》所反映的系列生活习俗。

随着《诗经》民俗学研究的深入,《诗经》所涉及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诸习俗被予以明晰分类和全面关注。涂庆红《〈诗经〉民俗的归类研究》^①将《诗经》中的风俗进行了统计,把同一种类风俗的各要素从诗中抽取出来,为《诗经》风俗研究做了基础工作。

众多学者撰写了大量论文,揭示《诗经》所蕴含的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给《诗经》以民俗文化的审视,形成了《诗经》研究相对稳定的领域。其中论及婚恋诗的文章相对集中,从民俗

① 涂庆红《〈诗经〉民俗的归类研究》,四川师范大学 2002 年硕士学位论文。

学角度全方位考究《诗经》记载的婚恋习俗、婚姻制度、婚姻形态等。袁梅《〈诗经〉中反映的先秦婚俗》^①认为,《诗经》中有不少乐歌反映了先秦时代“会男女”的风气,青年男女恋爱择偶尚有一定自由,不少诗歌反映了婚姻方面的“六礼”之制。毛忠贤《〈诗经〉涉及的三种婚俗形态》^②认为,《诗经》时代,专偶制婚俗已基本巩固,但母系和父权家长公社时代的婚俗残余,经过变异仍在民间和贵族婚俗中被保存下来。这种原始婚俗残余所形成的三种婚姻形态,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例证。黄维华《〈关雎〉与古代婚礼重别论》^③和《从周代婚姻礼俗看〈关雎〉》^④两篇文章,是从民俗学角度对《关雎》所做的新的考释。这类文章还有郜林涛《〈诗经〉所载上古婚嫁时令的文化内涵》^⑤、胡敬君《从〈诗经〉婚恋诗看周代婚姻的多元性》^⑥、武玉梅《从〈诗经〉看周代人的婚恋生活》^⑦等。李湘《民俗研究

① 袁梅《〈诗经〉中反映的先秦婚俗》,《文史知识》,1987年11期,21~26页。

② 毛忠贤《〈诗经〉涉及的三种婚俗形态》,《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735~738页。

③ 黄维华《〈关雎〉与古代婚礼重别论》,《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5期,15~20页。

④ 黄维华《从周代婚姻礼俗看〈关雎〉》,《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6期,109~115页。

⑤ 郜林涛《〈诗经〉所载上古婚嫁时令的文化内涵》,《晋阳学刊》,1997年6期,64~67页。

⑥ 胡敬君《从〈诗经〉婚恋诗看周代婚姻的多元性》,《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2期,100~102页。

⑦ 武玉梅《从〈诗经〉看周代人的婚恋生活》,《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1期,90~92页。

与诗经研究——说狐、茅》^①《〈诗经〉风雨应用系列》^②《〈诗经〉与中国葫芦文化——论匏瓠应用系列》^③等一系列论文,也都是从民俗文化角度研究《诗经》的力作。王渭清则着手于《诗经》与周代礼俗及其在关中西部民间遗存研究,借鉴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从《诗经》文本出发,探讨周代礼俗文化及其在关中西部民间遗存的人文价值和现代意义。^④

针对《诗经》的民俗文化研究倾向,梅琼林认为《诗经》阐释的首要任务在于文化还原,即必须通过各种认识途径,探视和描画《诗经》文化视界的原生面貌,必须在时空的种种阻碍中回溯《诗经》文化存在的客观历史条件。^⑤

关注《诗经》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是中外学者的共识。19世纪法国学者开了国外学者从民俗学视角研究《诗经》的先河,1838年法国神父拉沙尔翻译并由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比奥(M·Edouard Biot)作注的《诗经》拉丁文本和1896年由顾赛芳·库夫奥尔用法文、拉丁文对照的《诗经》

① 李湘《民俗研究与诗经研究——说狐、茅》,《中州学刊》,1988年1期,89~93页。

② 李湘《〈诗经〉风雨应用系列》,《中州学刊》,1992年5期,114~119页。

③ 李湘《〈诗经〉与中国葫芦文化——论匏瓠应用系列》,《中州学刊》,1995年5期,86~92页。

④ 王渭清《诗经所见周代礼俗与关中西部人文资源开发论纲》,《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4期,27~29页。

⑤ 梅琼林《文化本意的追溯:论诗经学民俗文化研究倾向》,《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2期,82~84页。

全译本,都是从社会民俗学视角予以介绍和进行研究的。比奥曾发表《根据〈诗经〉探讨古代中国风俗民情》的专论,倡导从社会民俗学角度来研究《诗经》,他认为《诗经》是东亚传给他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同时可能是一部真实性最无可争辩的文献。库夫奥尔在《诗经》全译本序言中也提到,《诗经》可能是最能向人们提供有关远东古老人民的风俗习惯和信仰方面资料的书籍,同时他对 305 篇诗作了分析和归纳,认为可以从中了解中国古代的服饰、建筑、农业、渔猎、旅行、射击、战争、婚姻、宴会、音乐、体育和天文等多项知识。

其后法国汉学家、社会学家格拉耐(Marcel Granet)出版了西方第一部深入研究《诗经》的专著《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①,他运用社会学和西方民俗学的研究方法,论证《国风》诸篇与中国古代节庆、歌舞、求爱、劳动等生活习俗的联系,描绘了一幅中国古代人民的风俗画。他吸取中国传统《诗经》传、注可取的阐释,探讨了远古中国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在做出自己的解释时,将古代希腊、日本、印度支那半岛以及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民俗资料进行比照,用以验证他对《国风》内容和艺术形式的解释,其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拉耐的研究具有文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等综合研究的性质,夏传才先生称《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

^① [法]格拉耐著,张铭远译《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